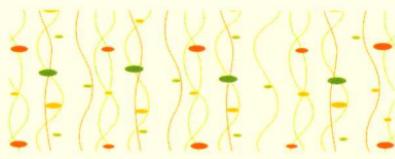


[随笔集]

生活在细节中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

朵 渔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圖
花城出版社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

生活在细节中

朵渔著 [随笔集]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活在细节中 / 朵渔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60-7194-0

I. ①生… II. ①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530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礼孩书衣坊

封面版画：Lynd Ward

书 名 生活在细节中

SHENGHUO ZAI XIJIE ZHO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b.com.cn>



朵渔：独立诗人，专栏作家。

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写作诗歌、文史随笔、时政专栏，兼及文学批评与研究。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诗建设》诗歌奖、屈原诗歌奖，以及《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著有《史间道》《追蝴蝶》（《诗歌与人》专刊）《意义把我们弄烦了》《最后的黑暗》《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说多了就是传奇》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

目 录

上卷 / SHANGJUAN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003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	019
我的生活无法重复	030
生活在细节中	043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052
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061
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067
永远不可能在极权的灰烬中找到钻石	073
我们之间的分歧必须保留	087
大师控	094
托尔斯泰的忧郁	100
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105
相信诗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115
愤怒把一个诗人捣碎成很多诗篇	122
辛波丝卡：从废墟上开出的花	128

生活在这世上 / 李南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60-7154-0

用爱点燃抒情诗的天空	134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	140
一位失败主义的大师	151
老虎·刀子·迷宫	164

下卷 / XIAJUAN

羞耻的诗学	181
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6
为疯子们辩护	204
诗如何思	215
何谓“为人生的写作”	224
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	231
真理性：论韩东	242
犹如雷电击碎大海……	263
飞蛾扑火的仪式	271
去爱，还是去恨	278

上卷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貌 ——加缪和她的《反抗者》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貌”——这是萨特在《禁闭》中对加缪的评价。加缪是萨特的朋友，也是萨特的崇拜者。萨特对加缪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法国文坛对加缪的评价。

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大街29号的一间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略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歇脚待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以胞胎的兄弟。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斯、以及弗朗西斯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呢！但是没办法，弗朗西斯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斯的嫂嫂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通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会招到的女人麻烦。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领达这样一个大口之家固阻固据，连龙都快要爆炸了。她不在乎幸福，她需要的是毁灭。”“我意犹未尽地对她说：‘我太想和你一起生活了，但你不能给我。’”他向自己终生热爱的女友玛丽亚·卡斯通坦抱怨说，“我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加缪和他的《反抗者》

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夫人街29号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没办法，弗朗西娜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艳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去跟别的女人厮混。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被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团团围困，感觉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伟大。“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

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无法在家里安静地工作，这是最折磨加缪的地方。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却难得清静。妻子弗朗西娜弹得一手好钢琴，诗人蓬热曾羡慕地说：“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却说：“如果你每天都要听上六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了远离这些深爱他的“家庭禁卫军”，加缪经常离家外出，带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农村短暂居住。

加缪在他不到 30 岁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和话剧《卡里古拉》。“在 30 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缪说，“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1947 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两个月售出了五万多册，加缪又大获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自由，也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焦虑。他的结核病也让他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伟大的作品却还没有写出。他想到托尔斯泰，“他在 1863 年到 1869 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 35 岁到 41 岁之间”。而加缪已经 36 岁了，“我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须加紧工作，把大作写出来，才能抵抗这随时会到来的绝境。“……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 10 个小时，以便尽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学随笔《反抗者》。

1950 年 1 月，同为肺病患者的乔治·奥威尔逝世，年仅 47 岁。加缪与这位《1984》的作者从未谋面，但两人同气相求。这更加剧了加缪的焦虑感。1950 年，就在加缪思考和写作《反抗者》之际，“争取文化自由大会”在柏林召开，法国的纪德、

阿隆、萨特、莫里亚克、布鲁姆，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莱、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内等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大会。加缪没有参加柏林的会议，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他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还在手记中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这也是加缪写作《反抗者》的题中之义。但整个1950年，加缪都深陷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难以自拔。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

2

关于“反抗”的概念，加缪已酝酿十年之久。当他完成《西西弗神话》，对“荒诞”这一概念进行阐发后，“荒诞”之后的世界就成了加缪新的关切点。虽然加缪极力为西西弗加油鼓劲——“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但“荒诞”依然一个非常容易滑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绝望厌世的逻辑起点。要为荒诞的人生赋予意义，加缪还需要“从虚无主义的深渊”向上进行“非逻辑的一跃”，而这次从“荒诞”向“反抗”的纵身一跃，正体现了加缪的才华所在和他固有的人道主义立场。

1949年，加缪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反抗的思考》的随笔，首次为“反抗者”下了一个定义：“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并非加缪狡猾的“辩

证法”，而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譬如一个奴隶，当他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并非从奴隶变成新的主人。肯定与否定共存，才真正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首先梳理和反驳了两种“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从历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几个时髦的文学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萨德，这位极端的反抗者发出最刺耳的“不”。虽然27年的牢狱生涯都未让他产生妥协的思想，他却一边向世界要求着“绝对的自由”，一边用单调的色情摧毁着世界的“是”。“世界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世界。”浪漫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花花公子美学”，艺术成为唯一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他们放浪形骸，却又与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脱不开干系。洛特雷阿蒙和兰波是花花公子美学的继承者。加缪对作为诗人的兰波充满敬意，“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一联想到这位诗歌的魔法师、通灵者自哈拉尔的来信中大谈金钱与收益，围着肚子的腰带里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你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年轻人的神话般的英雄吗？”

加缪在总结“历史上的反抗”时说，历史上大部分反抗行为，最终都堕落为“革命行动”。革命无非就是杀人，无论是奴隶的骚乱、农民的起义，还是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着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斯巴达克斯起义即是

这样一个典型。斯巴达克斯带领角斗士们揭竿而起，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当神圣的罗马城墙遥遥在望时，这支奴隶军队却停了下来，随即后撤，退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西西里。为什么要后撤？加缪说：“倘若这个城市被毁，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要知道，正是怀着对正义的渴望，怀着因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才使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到此时。但面对众神的原则，面对伟大的罗马城，他们退却了。他们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权利”，他们想成为与主人一样的人。如果奴隶军团攻陷了罗马城，他们以前的主人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所谓胜利，只不过是颠倒一下位置，杀更多的人。退却的斯巴达克斯开始溃败。他让人把一个罗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人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而他自己则不断地往前冲，希望遵循等价原则，与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同归于尽。他始终也没能靠近克拉苏，却死在同为奴隶的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一个罗马市民的死，最终换来的是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竖起的6000个十字架。

以“革命”为关键词，加缪还考查了自1793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不仅批驳了圣茹斯特的“断头台风格”，认为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解开了断头台的缆绳（“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都交给了恺撒。”），并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高尚的杀人者”展开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抗者的“不”与“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暴力与杀人的循环游戏。

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回到“不”与“是”的平衡上来。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简单地说“不”，因为仅仅说“不”，可能会沦为新的压迫与非正义。“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

生
活
在
细
节
中

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加缪提出了一种“南方思想”，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种与阴暗、暴戾的欧陆精神相对的地中海思想。加缪从小就在阿尔及尔的乡下长大，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处都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人也极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腊世界一样。加缪一直自视为一个乡下人，一个外省人，一个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为邻的地中海人。他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如果说欧陆精神是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现象学与历史辩证法所控制，那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着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净的、节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乐观的、理性的。

3

在写作《反抗者》的过程中，加缪曾将手稿拿给一些朋友看，但唯独避开了萨特圈子里的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干扰。1949年，乔治·巴塔耶曾问他进展如何，加缪觉得离自己的目标尚远。1951年6月，加缪终于集中半年时间，完成了《反抗者》初稿。他将初稿写在一种质地优良的羊皮纸上，大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劲头。加缪的老师格勒尼耶读完《反抗者》手稿后对加缪说：“你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加缪耸耸肩，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反抗者》甫一出版，即招致“超现实主义”阵营的反击。“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安德烈·布勒东首先指责加缪竟敢冒犯“现代最杰出的诗人”洛特雷阿蒙；他的朋友阿尔贝·贝甘对他说：“这真让人遗憾，您的书在右派那里大受欢迎！”言下之意是，加缪站错了队伍。对于来自左派的批评，加缪早有预料。在《反抗者》出版前几天，加缪碰到一个朋友，分手之际，加缪对他说：“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其实，加缪也不乏支持者。在加缪腹背受敌之际，汉娜·阿伦特写信告诉他：“我已读过《反抗者》，很喜欢。”波兰作家贡布洛维奇也托米沃什给加缪寄去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意思是，“我们处在同一条战壕中”。当然，诗人米沃什一直都是加缪的支持者。加缪的思想也并不孤独，早在1944年，比他更年轻的思想家波普尔就已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只是加缪没有读到。《反抗者》出版四年后的1952年，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也出版了。

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在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告诉加缪，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可能会发表一些评论《反抗者》的文章，但不会站在他那一边。这年5月，《现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弗朗西斯·让松的长文《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对加缪的“南方思想”进行了攻击。让松说加缪通篇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他认为加缪的最终企图无非是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合乎逻辑地通往斯大林体制”，他是在把历史道德化，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让松最后的结论是：“《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

让松的文章让加缪惊讶不已。他觉得让松的批评只是一种派别之争，“真理”和“正义”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人们判断一种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根据它是属于左派抑或右派，不然，笛卡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加缪回击说，“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最后干脆直接向“主编先生”喊话，说自己已厌倦了“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因为这些人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

萨特声称自己不爱与人争论，“宁肯与漂亮的女人谈琐事，也不愿与阿隆谈哲学”。但事已至此，“主编先生”也不得不接招了。“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开头还算温和，“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萨特用语开始尖刻起来，说加缪“阴暗自满”“顾影自怜”，“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萨特干脆否定了加缪在写作上的才能：“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个外行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最后萨特又冒出了巴黎哲学教授的傲慢与刻薄：“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

争论中，萨特明显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他对《法国观察家》说，“一场争论算不上什么——虽然不再见面了，那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 上，我们还是互相关心对方的”。萨特倒说得轻巧，加缪却身心

受伤。他来到女友玛丽亚的住处，神情沮丧，眼中含泪，“他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一般在家里走来走去”。女友劝他不必过于认真，但他做不到。“你想让我做什么呢？”他语带激愤地对女友说，“让我去揍他吗？他太瘦小了！”

4

1943年6月，话剧《苍蝇》在沦陷中的巴黎彩排时，加缪和萨特初次见面。萨特比加缪大8岁，他对加缪表现出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时常在花神咖啡馆相聚，谈哲学，聊女人。萨特个子矮小，长相近乎丑陋，与英俊潇洒、身高1.77米的加缪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两人在很多地方都大异其趣。萨特是个工作狂，一个“写字的怪物”，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为了写作，他会像巴尔扎克那样一杯接一杯地狂饮咖啡，甚至不惜用毒品提神。“只要能够写出《辩证理性批判》，我宁愿把自己毁掉。”莫利亚克说他“简直成了一只不停地写字的手”。他视作品如粪土，一旦写完，便不再过问。很多作品，往往只进行到一半就放弃了。“您现在在做什么？”在他死前几个星期，一个朋友问他。“我在研究马塞尔·墨斯和‘奇异思想’。”“这是您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啊！30年前您就写过一百多页的文字。”“噢，是吗，我忘记了……”加缪则要节制得多，他不会像萨特那样不分主题随便乱写，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谨慎得多，毕竟他的肺病让他随时感受到死神的威胁。“疾病是一座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萨特不喜欢家，不喜欢孩子，喜欢住酒店，喜欢在嘈杂的咖啡馆写作。“毫无疑问，咖啡馆就是一种充实的所在，那里有顾客、桌子、软垫长椅、镜